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北方屏障

■李梦蝶 白雪飞 周一

1938年3月底，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建成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多次致电贺龙、关向应等，询问、探讨在大同以北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在5月14日作出《关于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八路军“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并请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迅即考虑此事”。

大青山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阴山山脉中段，东西长约35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是一条纵贯东西的庞大山脉，在抗战时期这一地区主要归属绥远省。从地理位置上看，大青山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它位于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北面，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重要门户；另一方面，大青山东连集宁、西抵包头，是连接国内与蒙古、苏联的重要陆上通道。因此，控制住大青山，既可以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又可以通过此地与苏联进行联系，对开展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行动都有裨益。

日军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覬觎大青山一带的特殊地位，并企图利用此地蒙汉民族杂居等民情特点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奴役当地群众、掠夺资源，把这里变成他们“以战养战”的前方基地。有鉴于此，八路军总部经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由第120师率先派出部分力量，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顽强北进，两出杀虎口

1938年6月下旬，第120师抽调第358旅第715团为主组成大青山支队，作为挺进大青山的主要力量，由该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7月中旬，为充实北上兵力，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4支队在军事上划归大青山支队指挥。第4支队的前身，是由山西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虽然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系统的军事训练，但是这支队伍成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可塑性强，师生的爱国热情高涨、作战勇敢，是敌后不可多得的抗战生力军。除这两支战斗力量外，战动总会在山西岢岚组建了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还抽调人员组成干部队，随时准备同部队一起出征大青山。

7月29日，大青山支队誓师出征，正式踏上北进征途。出发当日，大青山支队3营作为先遣分队，快速从杀虎口突破敌人在长城南北地区的防线，直入绥远凉城境内。八路军的突然出现，让盘踞在当地的日伪武装大为惊恐，他们马上调集数千兵力，企图把大青山支队消灭在长城脚下。由于敌人严密控制着多条交通要道，且此次北上的官兵大多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水土不适应，战斗力有所削弱，支队领导决定分路突



大青山支队伏击日军。资料照片

围，先保存有生力量，再择机向大青山进发。

8月中旬，大青山支队再次从杀虎口北上。这一回，部队吸取上次暴露目标的教训，采取昼伏夜出、快速行军的办法突破敌人封锁区，于9月1日抵达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集宁一带，初步完成进军任务。在此期间，支队1营在参谋长姚喆带领下转战蛮汗山，一面为主力部队突破平绥线提供掩护，一面将此地作为沟通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中转场所，不断接收转运至此的大批军用物资。至10月初，支队1营也越过平绥线，在速勒图一带与主力会合，圆满完成挺进大青山的任务。

重拳出击，三战大青山

由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驻守绥远的国民党军就南撤到山西境内，导致大青山一带在短时间内沦为敌占区。侵华日军已在此地经营多时，沿公路、铁路线建立多个伪政权组织，培植汉奸势力，鼓动民族分化，借此削弱抗战力量，奴役当地群众。长期处于剥削压迫之下的当地群众，情绪极为消沉。八路军进入大青山之初，部分群众甚至闭门不见或避战进山，给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支队领导经过研究，决心先打几个胜仗，以亮明身份、鼓舞士气，同时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强群众的斗争信心。

9月3日，李井泉率领支队2营、3营向集宁附近的陶林进发。陶林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镇，也是集宁以北最大的经贸中心，有日军1个中队、伪军3个中队在此驻防。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并快速实现破敌战果，李井泉命令部队在午夜时分发起进攻，首先打击战斗力较弱的伪军。果然，城中伪军一听枪响，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我军迅速将碉堡

内的日军中队包围，准备组织强攻。就在此时，侦察员报告集宁日军已经出城，李井泉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快速打扫战场、撤出战斗。

首战陶林，虽未大量消灭日军，但打出了大青山支队的声威，也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9月10日，支队主力转战至乌兰察布乌兰花镇，几乎将镇中的伪蒙军1个加强连和四子王旗保安队一部全部生擒，并缴获战马100余匹。随后，部队在乌兰花地区展开抗日宣传，不仅当地群众大受鼓舞，纷纷支持八路军，就连四子王旗的伪组织也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表达愿意配合抗战的意愿。为团结当地各方势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队决定释放被俘的伪蒙军和保安队，伪组织也表示“将严守中立，绝对不打八路军”。

乌兰花战斗之后，支队官兵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便寒风凛冽、衣着单薄，也不入民宅，对群众秋毫无犯。很快，大青山支队官兵的良好声誉在草原上广为流传，当地群众纷纷慰问部队官兵。9月下旬，在群众支持下，支队2营奇袭大青山中段要隘蜈蚣坝，并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诱使归绥日军前来救援。2营在日军必经之路上布设口袋阵，待日军车队进入后先把车尾车辆击毁，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再发起猛烈冲锋，仅用25分钟就全歼了这股日军，取得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以来的一场重要胜利。

因地制宜，建强骑兵队

大青山地区的地形相对平坦开阔，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村落、集镇比较稀疏，不利于实施徒步游击作战。1938年冬，为增强部队机动性、提升战斗力，李井泉向党中央报告了组建骑兵部队的想法，立即获得中央的肯定和支持。然而，想要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骑兵部队，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困难，一是大青山支队缺少足够的战马，二是大部分官兵都没有喂养马匹、骑马战斗的经验。

为解决马匹短缺的困难，支队决定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对内，主要是通过动员当地群众，向部队捐赠或低价出售马匹。由于前期的宣传动员工作扎实有效，当地群众一听说八路军要建立骑兵部队，就自发赶着马匹捐赠部队，部分群众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潜入归绥城内采购鞍具等，为支队补充骑兵战斗器材。对外，就是通过作战缴获敌人的马匹。大青山支队发动分散在各地地区的营、连，主动攻击当地的土匪武装，一来可以减轻他们对当地群众的迫害，二来可以缴获他们的战马充作军用。比如，1939年1月底，驻扎在绥南的大青山支队一部，将此地的土匪悉数歼灭，缴获战马100余匹。

至于缺少喂养马匹的经验，大青山支队的官兵向当地牧民虚心求教，向他们学习喂马、骑马和驯马的方法，还向兽医请教养马常识和钉马掌方法。不到两个月时间，不少基层指战员都熟练掌握了喂马养马。支队官兵还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掀起群众性练兵的热潮，重点对骑兵战术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在短时间内掌握比较系统的骑兵作战技能。194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大青山支队正式改名为大青山骑兵支队。1940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游击根据地展开“据点”分区式的搜剿。骑兵支队利用自身机动性强的特点和山区有利地形，与敌人进行周旋，并在时机成熟时接连在绥西一带打了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围攻之敌在找不到我军主力，且自身疲惫受损的情况下，灰溜溜地撤回据点。大青山骑兵支队在战斗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支驰骋在草原上的强大机动作战力量。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八路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础上，派兵前出归绥一带建立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创建，改善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形势，筑牢了党中央的北部屏障，也成为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军重要的进攻出发阵地。1942年10月24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将归绥（即大青山）与雁北（即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雁北抗日根据地遂紧密联系在一起，各部队统一指挥、共同战斗，为后期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四军军部是新四军领导机关的总称。自1937年10月新四军宣布成立，至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新四军军部驻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先后经历7次较大的搬迁。每一次转移都承载着战略调整的深意，也深刻影响着华中敌后抗战的进程。

成立于汉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从1937年秋开始，叶挺、项英、陈毅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了紧张、艰巨的组织筹备工作。11月下旬，叶挺遵照毛泽东同志“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开始新四军军部正式组建工作。经过反复考察，叶挺最终选定位于大和街26号的1幢2层住宅楼，并命人在该楼悬挂“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

为加强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八路军陆续抽调干部到新四军工作。第一批抽调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约30人，他们从延安动身，于12月23日到达武汉，与叶挺、项英会合。12月25日，叶挺、项英和张云逸在汉口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会议。会上，叶挺、项英就抗战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进行讲话。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大和街26号挂出的“新四军筹备处”牌子正式替换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

在汉口这段时间，叶挺、项英为尽快建立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来的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和后勤补给等问题。

健全于南昌。1938年1月6日，因战事需要，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三眼井。随着干部陆续到达，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构逐步建立。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口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

在南昌期间，新四军军部初步完成军部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充实，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完成南方八省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任务。经过整编后的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共1万余人。部队开展整编的同时，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战地服务团，走上街头，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加入，南昌一度成为东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搬迁至皖南。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3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镇一带整训。新四军军部当即制订方案，并命令部队分头并进。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于5日进驻岩寺。在岩寺期间，军部的具体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做好部队的编组、充实部队的武器装备、加强部队的军政训练和开展民运工作。

5月5日，新四军军部奉命离开岩寺，于7日移驻太平县麻村。26日，军部又由太平县进驻南陵县土塘村。在这里，新四军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

8月2日，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开始了近3年的“云岭军部”时期。在此期间，军部切实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召开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及新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代表中共中央进一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这个方针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为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重建于盐城。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损失惨重。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

的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损失惨重。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

的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损失惨重。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

的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损失惨重。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

新四军军部驻地的几次变迁

■胡遵远 陈仁喜 黄涛涛

持抗日斗争，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5日，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在苏北盐城隆重召开，将新四军和活动时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转移到阜宁。1941年7月初，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向阜宁地区转移，先后移驻左家庄、刘家舍、佟周庄、停翅港、单家港等地。在此期间，军部组织新四军各部投入反“扫荡”战斗，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相继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镇，粉碎了日伪军企图其占领区、消灭抗日游击武装的企图，胜利保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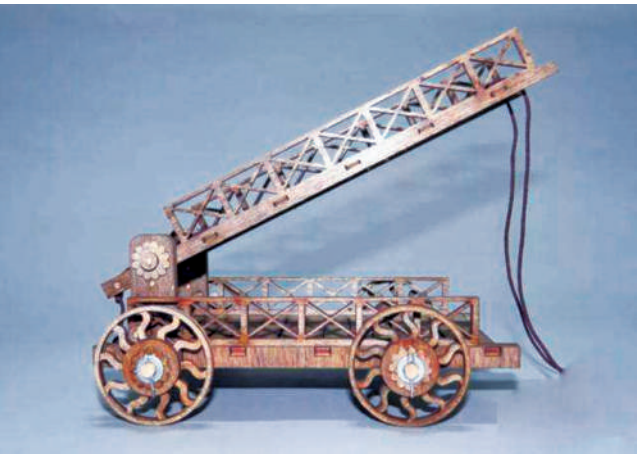
驻留黄花塘。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迁至盱眙县黄花塘，在此驻留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军部领导全军开展整风、大生产、军政大整训，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顺利进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再移千棵柳。1945年2月28日，军部由黄花塘转移至江苏盱眙县东南约50公里处的千棵柳。之后，新四军拟发动淮南津浦路西反顽战役，从整个战役考虑，军部决定随参战部队一同移至淮南津浦路西。4月10日，军部从千棵柳迁驻淮南津浦路西的大赵庄。战役告捷后，军部再度迁至千棵柳，直至抗战结束。其间，在军部指挥下，新四军各部实行战略反攻，攻克阜宁、睢宁县城及100余处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发展并创建了苏浙皖边和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军部还曾搬迁至江苏淮阴和山东临沂。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至此，新四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的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资料照片



现代复原四轮折叠桥模型。资料照片

在中国古代攻守城作战中，城池外的护城河及壕沟是守城方首道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有效阻挡和迟滞敌军及其各类攻城器械推进。攻城方若想抵近城墙展开进一步攻城行动，就必须跨越护城河和各类壕沟，这就离不开接通类攻城器械。其中，壕桥和填壕车便是接通类攻城器械的典型代表。

壕桥是用来连接护城河及壕沟两岸的攻城器械，其典型形制是在两根纵向长直木上，横向铺满并固定木板，形成具有一定宽度的桥面，桥面下安装车轮以便推行，其展开后可横跨护城河或壕沟形成临时桥，供攻城士兵和器械通行。早在战国时期，壕桥已初具形制，名为飞江或飞桥。《六韬》记载其规格为长1丈5尺（约4.7米）、长2丈（约6.26米）以上，采用转轴、轳辘等机械装置，且8具联用可形成12丈（约37.5米）宽的通道，

展现了早期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唐宋时期，壕桥经过持续发展，成为如今我们所知的形制。《武经总要》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记载了3种壕桥：两轮壕桥、四轮壕桥和四轮折叠桥。书中载：“壕桥长短，以壕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壕桥相接，中旋转轴，用法亦如之。”这一时期的壕桥在使用时，面对窄的护城河或壕沟，可直接推入河壕以车轮填平，面对宽的护城河或壕沟，则采用可伸展的折叠桥进行跨沟作业。这种攻城器械为士兵突破护城河防线、实施贴城作战提供关键的通行保障。在唐朝平高句丽的辽东城大战中，唐将李世勣在攻城时，就曾利用壕桥助唐军跨越护城河，最终成功攻克白岩城。

填壕车与壕桥的功能设计理念有所不同，壕桥是通过架设临时桥梁实现

快速跨越，填壕车则通过自身所具备的防护功能，保护士兵在守军箭矢攻击下进行壕沟填埋作业。填壕车形制一般是以一辆大型四轮车为底座，便于推行机动；车前面竖起冲立（即结实的木板）作为遮挡装置，冲立顶端有绳索拴在车尾，用以固定和施放冲立；车上则载满土石等填埋物。在攻城作战时，攻城车士兵可借助冲立的掩护进行填壕作业。当遭遇敌军破坏桥梁情况时，士兵可解开拴在车尾的绳索，使冲立倒伏放平，形成临时桥梁使用。《武经总要》中记载了两种填壕车，一种名为“填壕车”，其主体结构采用方形木屋结构，木屋的外蒙皮革用泡钉固定，下设两轮可供推行，木屋内可载物藏兵，前侧上半部分有可活动遮挡板，通过长杆与后侧绳索相连，后侧士兵可通过拉拽绳索调整其遮挡角度。另一款名为“填壕车”，其车为4轮，车前设置可竖起、可放平的冲立，冲立与车床之间有倾斜的木质支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